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91-99.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9dnprf>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周维炜 (Zhou Weiwei)

摘要：《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通过悬念设置、形象塑造和空间书写等叙事策略在显性与隐性并行的叙事结构中揭示了后“9·11”时代身份、权力与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小说首先在显性层面设置了关于陌生人的身份悬念，然后在隐性叙事进程中暗藏反转。此外，哈米德还从形象塑造的角度展现了昌盖兹在双重叙事进程中的矛盾形象，既是文化冲突下的“受害者”，也是全球化体系中的“加害者”。该小说在显性叙事中以不同的空间场景串联起昌盖兹的故事经历，而隐性叙事通过氛围营造、细节描摹和人物互动，揭示出潜藏于该空间内的权力关系、文化张力与心理状态。这一叙事策略促使读者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个体与集体、东方与西方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双重叙事进程；后殖民文学；叙事策略

作者简介：周维炜，广州华立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翻译，电邮：790979644@qq.com。

Title: On the Dual Narrative Procession 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Abstract: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employs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suspense, characterization, and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o reveal the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power,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post-9·11 era through a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operates on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levels. At the explicit level, the novel establishes suspense strategy on the identity of the stranger, while the implicit narrative process conceals an underlying reversal. Furthermore, Hamid portrays Changez as a contradictory figure in this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both a “victim” of cultural clashes and a “perpetrator” within the globalization.

On the explicit level, the novel connects Changez's experiences through various spatial settings, while the implicit narrative, through atmosphere creation, detailed descriptions, and character interactions, reveals the underlying power dynamics, cultural tension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hidden in these spaces.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urges readers to re-examine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Dual narrative processi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arrative strategy

Author Biography: Zhou Weiwei, English Teach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Huali College. Research Area: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E-mail: 790979644@qq.com.

一、引言

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莫欣·哈米德 (Mohsin Hamid) 于 200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架构与深刻的主题探讨，成为当代后殖民文学领域备受瞩目的重要文本。小说采用独白叙事框架，通过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向一位陌生美国人的讲述，回溯了他从追逐美国梦的华尔街精英，到“9·11”后陷入身份危机、最终回归故土的心路历程。小说自出版以来，学界展开了多角度探讨。哈特奈尔 (Anna Hartnell) (2010) 将该作品解读为对反恐战争中种族主义核心逻辑的批判。海德尔 (Nishat Haider) (2012) 认为小说通过揭示帝国主义的运作轨迹，挑战了对恐怖主义的简单叙事。艾哈迈德 (Ayesha Iftikhar Ahmed) (2021) 聚焦文本中的性亲密书写，将其塑造为后“9·11”时代紧张关系的寓言，论证小说通过交织创伤叙事与亲密关系，揭示了“疗愈”话语如何被“武装化”为一种潜在的侵犯性力量，僭越了他者的不可接近性。法希姆 (Muhammad Afzal Faheem) (2022) 则集中于主人公从西方认同到反殖民立场转变的身份重建。国内研究层面，朴玉 (2019) 指出该作品在呈现流散经验、彰显穆斯林族裔身份的同时，亦深刻体现了“去领土化”意识与跨国书写主题。付满 (2019) 剖析了小说中新蒙昧主义的符码暴力，以及美国所奉行的“金融基要主义”及其对新移民群体的专制性索偿。夏辉 (2021) 则从哀悼与忧郁症的伦理逻辑出发，探索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构建非暴力关系的可能性。现有研究虽涵盖主题广泛，但对小说叙事策略的探讨尚显不足。事实上，故事表层情节发展之下，潜藏着另一股的叙事暗流，构成了一种与显性叙事并行的“隐性进程”。隐性进程并非情节的分支或深层结构，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平行叙事。它与表层情节并列推进，常呈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人物塑造和审美层面形成对照补充或颠覆的关系 (申丹, 2021, p.3)。该小说显性情节发展与隐性叙事进程并置所形成的艺术特质，实为其核心亮点之一。这种双重叙事结构有效构建了文本的表层叙事与深层结构，使其得以超越单一主题解读，从叙事策略层面重新认知作品主题思想所呈现的艺术特色。鉴于此，本文援引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基本原理，聚焦悬念设置、形象塑造与空间书写三种叙事策略，深入探究该作品双重叙事进程的特色，从而阐明其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深化对身份、权力与文化冲突的探讨。

二、悬念设置的双重叙事进程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悬念和双重叙事进程的有机结合，使显性叙事进程中呈现的人物表象与隐性叙事进程中揭示的人物本质之间形成明显的张力。悬念作为一种关键的叙事策略与读者心理机制，表现为读者对文学作品中未知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关切与期待心理。“悬念在小说中是激发读者阅读兴奋的因子，时常能引起读者揣摩下文的好奇心。”（庞好农、刘敏杰，2022，p.2）哈米德在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处理中，巧妙地利用双重叙事进程来构建并强化核心悬念。这种结构不仅呈现了表面的矛盾冲突，更通过显性进程的叙述引导与隐性进程的潜在暗示，不断引发读者对事件真相和人物本质的深层疑问。这种持续的疑问驱动着读者深入文本寻找线索与解答，并在此过程中能深刻体验到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与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茶馆中美国陌生人的身份无疑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总悬念。王庆生（1987，pp.150-151）指出：“总悬念是指在小说的开头所设置的提挈全篇、笼罩全文的悬念，是给小说打下的一个完整的‘结’。它往往是小说中主要矛盾、主要事件、主要情节的表现”。哈米德在显性情节和隐性叙事进程中分别设置了关于陌生人的身份悬念，再通过叙事暗流的方式，颠覆故事发展中的人物形象，在谜底中对西方凝视的东方主义进行反转，揭露“陌生人”如何沦为被凝视的客体。

在显性叙事进程的情节发展中，它表现为一个贯穿谈话始终、关于对方身份的谜题。昌盖兹的独白与对美国访客反应的观察成为关键线索。他捕捉对方的肢体语言、表情与环境氛围的波动，逐步构建其身份悬念。昌盖兹先是多次提及对方显而易见的紧张与戒备状态。譬如当茶馆里的侍应过来时，昌盖兹发现“您似乎有些紧张，没有必要……没必要把手朝外套口袋里摸，我猜您是要掏钱包吧。”（哈米德，2009，p.5）¹以及茶馆里跳电时表现出的警觉，“跳电和让电在巴基斯坦是家常便饭。真的，您反应过度了……可以清楚地看见您站在那里，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我可以向您保证：没有人会要来偷您的钱包。”（p.56）另外关于“口袋里的东西”的暗示引导读者推测其可能携带武器，其身份可能为官方执法者或特工。此外，昌盖兹在进一步的观察中注意到对方对环境的过度警觉。在茶馆内，昌盖兹评论道：“您时不时刻意地朝四周张望，您把目光移来移去的样子……让人看了觉得像是某个动物来到了远离自己巢穴的地方，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不知道自己究竟将成为猎手还是猎物！”（p.29）跳电时再次指出：“真不走运！灯都灭了。但您为什么要跳起来呢？不必感到吃惊……”（p.56）这种职业化的警惕性，与普通游客或商人的行为模式截然不同。紧接着昌盖兹主动发起言语试探，观察对方非语言回应。如在质疑访客此行目的时，“反正您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漫无目的地到我们这里来瞎逛的旅游者。”（p.71）以及谈论武装冲突话题时推断：“啊哈！这么说您当过兵，先生，我果然没猜错！”（p.118）更通过观察西装胸口的凸起暗示：“那是我们国家的便衣特工喜欢别腋下枪套的地方”。（p.127）立刻引发了对方调整坐姿的警惕反应。这些显性细节虽未直接点明身份，但勾勒出其为肩负秘密任务、携带武器、高度戒备、代表美国国家力量的官方人员。这一悬念的逐步揭露，正是显性叙事进程推进读者理解的关键驱动力。

然而，正是在这看似清晰的身份揭秘之下，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却悄然编织着另一重解读的可能——一个在异质文化空间中被彻底凝视、被客体化，甚至被边缘化的“他者”。这一反转挑战读者基于显性线索的预期，凸显权力关系的流转。在显性情节层面，小说遵循着传统悬念的逻辑，将

¹ 莫欣·哈米德（2009）：《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权力重心完全倾向于这位美国陌生人。昌盖兹通过一系列观察不断强化其作为秘密特工或执法者的身份猜想。在这个进程中，读者与昌盖兹一同将陌生人定位为一个来自世界权力中心、带着明确目的、掌握着潜在暴力的主体。他是凝视的一方，而昌盖兹则是被审问、被评估的客体。这种设置符合后“9·11”时代西方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普遍想象，即一种主动的、带有审判性质的干预。隐性进程中，陌生人被剥夺言说权利，无法自我辩解，完全被禁锢于昌盖兹的话语中。昌盖兹通过垄断叙事，将本应是权力主体的陌生人降格为被动客体。

随之而来的是“凝视”权力的反转。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他者的凝视”将“自我”客体化，揭示凝视所带来的主体性剥夺与被客体化经验。（萨特，2007, pp.337-341）小说中，昌盖兹却反向挪用了这种权力，以细致描述诠释陌生人的一举一动：“您似乎有些紧张”、“您反应过度了”、“您把目光移来移去的样子……让人觉得像是某个动物”。原本的主动观察者被置于昌盖兹的描述下，每个动作被赋予政治与文化意义，被塑造成“美国”的化身——那个曾在普林斯顿接纳他、在恩德伍德·山姆森（Underwood Samson）公司异化他、又在“9·11”之后背弃他的庞大权力中心。昌盖兹直面一个被他符号化的“美国他者”，进行反向凝视与清算。这种从个体到符号的转化是“他者化”最关键的一步，它不仅剥夺了对方的主体位置，也令其成为可被阐释和批判的“话语对象”。

最终，隐性叙事完成了对既有权力话语的反转。贯穿全书的“陌生人之谜”并未被直接揭示，而是被引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昌盖兹如何通过话语重构他者的身份？来自权力中心的美国人在异乡的茶馆中被剥夺了言说权，成为被阐释和符号化的对象，从而体验到无力与边缘化。哈米德借此表明，在权力不对等的跨文化遭遇中，身份并非静态的，而是通过话语的争夺被生产、置换与颠覆。昌盖兹通过占据叙事主导，将审视者降格为被审视之人，既是对西方凝视的反击，也揭示了权力借叙述再生产的过程。由此可见，双重叙事不仅推动了显性情节的悬念，更通过显性与隐性进程的张力丰富人物层次，揭示了跨文化权力关系的复杂性，迫使读者重审主体与他者的界限。

三、形象塑造的双重叙事进程

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主人公昌盖兹以第一人称的长篇独白，将一段跨越巴基斯坦与美国的个人经历娓娓道来。这种叙事策略本身蕴含着显性与隐性的双重层面。在显性叙事层面，提供一种表面清晰、情节连贯的故事逻辑，而在隐性叙事层面，则通过细节、语调、情感态度等非直接的信息符码，向读者暗示甚至揭露潜在的另一种解读路径。在显性叙事中，昌盖兹呈现的是一位“9·11”事件之后的移民“受害者”形象：一个追逐美国梦却最终幻灭的青年，被外部的社会与政治排斥所迫返回故土。然而，在隐性叙事中，他又显露出作为全球化资本体系中“加害者”的另一面：他曾积极为跨国资本运作卖力，参与压榨他国利益，对西方的价值体系保持高度认同，并在私人关系中呈现出占有与控制的欲望。通过双重叙事的交织与张力，作者塑造出一个矛盾、立体且难以用单一标签定义的人物形象。

在显性叙事中，昌盖兹展现出努力融入美国的普林斯顿精英，极力迎合竞争至上的价值观。吉姆评价道：“你是班上的第一名。你的导师们说你很有斗士的气质。”（p.42）在菲律宾出差期间，他也开始享受到作为美国代表在国际场合中的优越感：“斜靠在座椅里，穿着笔挺的西服，给我送香榨的是一位迷人而又——对。我能允许自己这么想脸皮真是够厚的一轻浮的空中小姐。”

(p.58)、“在自己的尊严所许可的范围内,让自己的言谈举止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美国人。”(p.60)这些叙述彰显了他的勤奋、适应力与自我塑造的主动性。而这背后,是一种对美国梦的坚信与投入。然而“9·11”后,他因穆斯林身份备受排斥。先是在马尼拉机场,“我被一个武装警卫带进一间屋子,遵命脱得只剩一条拳击短裤。”(p.68)再到“踏入机舱的时候,同机的旅客朝我投来一片关询的目光.....我很清楚地感到了自己所遭受的怀疑,我感到自己像个罪人。”(p.68)同事的态度也随之变化,他们“没有等我,等我进入海关大厅的时候,他们已经拿了行李离开了。”(p.69)与此同时,针对穆斯林的敌意传言也不断传来:

“他们说巴基斯坦的出租车司机遭到了殴打,不敢离开他们的生活区一步;联邦调查局最近常常突击检查清真寺、店铺甚至他们的住家;穆斯林男性常常失踪,可能是进了秘密的拘留中心接受盘问或者是更糟的事情。”(p.86)

甚至牵涉出种族歧视,遭到陌生辱骂:“操你妈的阿拉伯佬。”(p.107)这种幻灭感使他意识到“美国梦”的本质:

“我成了一个现代版的苏丹禁卫军战士,正在为美利坚帝国效劳,而此时,它正在仪路一个与我的祖国血脉相关的国家,而且甚至还有可能共谋要将我的祖国拖入战争的阴影.....我过去把自己的命运和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的那些人州绑到了一起,和帝回的官员们捆绑到了一起.....这些人的生命在帝回眼里是视如草芥的,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它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pp.138-139)

他的自述中似乎在证实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所造成的边缘化与排斥。在显性层面中,这样的叙述建立起了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逻辑。这种“受害者”形象的表层叙述,提供明确的情感引导与人物立场。

然而,隐性的叙事暗流瓦解了这种单纯受害者的印象。首先作为资本逻辑执行者昌盖兹,在可能导致裁员的项目中“感到精力充沛、底气十足,因为我知道我的团队正在构建着未来。”(p.61)缺乏道德悔意。这种冷静、甚至略带骄傲的职业态度,在隐性叙事中成为他“加害者”身份的重要证据——他不仅是资本逻辑的执行者,更主动吸收、拥护西方核心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与显性叙事中那个被美国社会排斥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提到,“第三空间”是文化意义生成和身份协商的场域,作为其中的主体往往一方面享受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资源与优势,另一方面却在文化认同上处于边缘和不稳定状态。(Bhabha, 1994, p.218)昌盖兹既是美国梦的追逐者,也是全球资本扩张的利器,这种混杂性使得他的形象在显性与隐性之间不断摆动。其次,他对于故土巴基斯坦的态度也是被隐性叙事所揭示的重要部分。回到拉合尔时他是用美国眼光来审视自己家乡的陈旧、落后与保守:“看见我的家这副样子,我不禁悲从中来——不,不止是悲,甚至感到了羞愧。这就是我的出身之地是我一切的开如之地,它竟然透着这样一股贫贱的气息。”

(p.114)表现出对拉合尔的轻视和与之保持距离的心态。这种态度代表着一种内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的秩序与效率视为优越标准,从而在心理上将自己与落后的故土拉开距离。这种“内殖民”的自我认同,使他在隐性叙事中不仅远离被压迫者的立场,反而站在了压迫的文化逻辑一边。再者,在个人情感关系上,昌盖兹与艾丽卡的关系同样揭示了他的私心。显性叙事将两人的关系塑造成一

段跨文化的悲剧爱情：艾丽卡无法走出前男友的阴影，而昌盖兹真心投入却终究失去。然而，隐性叙事的细节显示出一种潜在的虚荣与支配欲。结识艾丽卡后接触到上流社会环境，让昌盖兹颇为得意，“甚至自大地以为我的生活就该是这样的，不管怎样我最终都会和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在这种高尚的场所并肩而立。艾丽卡担保了我的价值。”（p.78）又甚至试图在性关系中通过取代其前男友而“觉得自己获胜了，突然间，这似乎成了一条有可能向前推进的路。”（p.96）这种微观的情感控制与其宏观的资本帮凶身份互为镜像。

最后在小说结尾，昌盖兹与美国客人走出茶馆，街道的紧张氛围笼罩着最后的叙述。作者没有揭示是否发生了暴力事件，这种开放性的悬置，使得昌盖兹最后的形象保持着双重甚至多重的不确定性——他是单纯的叙述者、善意的导游，还是潜在的威胁者？这种无法收束的形象状态，本身就是双重叙事的逻辑结果。在显性叙事中，他似乎只是在送别客人；而在隐性叙事中，他的身份、意图和道德立场依然悬而未决。这种不确定性映射出全球化背景下身份与立场的流动性和模糊性。综上，显性叙事中的受害者讲述与隐性叙事中的加害者细节共同构成了昌盖兹这一复杂人物的形象。显性叙事是表层的、直接的身份构建，而隐性叙事则通过细节暗示与价值反转，不断对表层身份进行补充、修正乃至颠覆。正是这种显性与隐性并存、互为镜像又互相冲突的叙事结构，使昌盖兹成为一个可以跨越单一时代语境、在多重文化与政治视野中反复解读的开放性形象。

四、空间书写的双重叙事进程

在叙事文学中，空间并非仅为承载人物与情节的物理载体，更是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人物心理的动态投射。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任何人类群体的共同生活形式中都至关重要，在权力的运行中起到关键作用。（Foucault, 1984, p.252）空间叙事承载了地域文化、政治状况和人物心理演绎的写实性表现形式，不仅是小说情节生成和发展的状态叙述方式，还是作家世界观和价值观展现的重要载体。（庞好农、刘敏杰, 2022, p.254）《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正是通过空间的双重书写，揭示了在后“9·11”语境下身份、权力与文化冲突的复杂交织。小说在显性层面上，以不同的空间场景串联起昌盖兹的经历，形成了一个看似清晰的个人成长轨迹；然而，在这一表象之下，一股隐性的叙事暗流通过氛围营造、细节描摹和人物互动，揭示出潜藏于该空间内的权力关系、文化张力与心理状态，时常与显性意义构成鲜明的对照、补充乃至颠覆。通过对小说中三个关键空间——拉合尔茶馆、美国（纽约/普林斯顿）以及作为全球化象征的“第三空间”（如马尼拉、瓦尔帕莱索）——进行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哈米德如何借由空间的转换与重塑，将身份冲突、权力博弈和文化对抗的核心议题予以深化，使之成为理解整部作品叙事艺术的关键。

小说的框架结构被巧妙地设置在拉合尔的一家茶馆内，这个空间的首要显性叙事，是东方传统中的“好客”之道。昌盖兹以主人的姿态，热情地引导着那位沉默的美国陌生人进入这个充满地方风情的场域。他主动邀请、为客人点单、细致地介绍当地的美食，其言行举止无不营造出一种他是慷慨好客的主人、而美国人是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的传统氛围。这个空间在昌盖兹的话语中，被刻画成一个开放、闲适且充满巴基斯坦文化魅力的符号。他似乎在向这位西方来客展示一个真实的、非刻板印象的东方，一个可以坐下来平等交流、分享美食与故事的和平之地。这是他精心呈现在叙事表层的空间形象——一个文化交流的起点。然而，隐性叙事将其逆转为充满压迫的审判场域。陌生人始终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紧张与戒备，“像是某个动物来到了远离自己巢穴的地方，面对一

个陌生的环境，不知道自己究竟将成为猎手还是猎物！”（p.29）这一比喻暗示了茶馆异化为一个充满未知威胁的猎场。随后的停电事件，则将这种潜藏的张力瞬间引爆。陌生人的惊跳反应，以及他反复将手伸向外套口袋的动作，都在昌盖兹的话语引导下，被赋予了携带武器、随时准备对抗的嫌疑。在昌盖兹连绵不绝的独白与层层递进的心理攻势下，话语权也似乎渐渐被剥夺，茶馆也因此氛围上逐渐凝重，演变成一个话语的囚笼。离开茶馆时，夜幕降临，周围环境逐渐黯淡，原本开放的街边茶馆在感官上变得愈发幽闭。那位“健壮”的侍者貌似紧随其后，一辆汽车引擎的“一声巨响”更是在这紧绷的时刻，被解读为潜在的枪声，让陌生人备受惊吓。小说的结尾处侍者的逼近与陌生人疑似掏枪动作一闪而过的“金属光泽”，将悬念推向极致，留下暴力边缘的开放式结局。

另外，美国空间也经历了从“应许之地”到排异熔炉的转变。显性层面，普林斯顿与华尔街象征成功，昌盖兹自豪于“普林斯顿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我的生活是一部电影，我是领衔主演的大明星，一切都有可能。”（p.3）并享受着“.....人类所知的技术最先进的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p.31）此时的美国构成了他社会地位急剧攀升的物理证明，服务于一个近乎完美的新移民奋斗史叙事模板，满足了读者对于成功融入的初步想象。

然而隐性层面，“9·11”后的美国充满了敌意。曾经熟悉的街道、机场、办公室，都变成了充满审视与怀疑目光的敌意场所。机场成为一个尤为典型的案例，他一次次被带到一边接受额外盘问，被剥光衣服检查，这种屈辱性的经历将空间变成了执行权力与规训的工具，不断提醒着他“他者”的身份。他与艾丽卡的关系也隐喻了美国无法真正接纳他，他只能充当逝者的替身。她沉溺于对已故男友克里斯的怀旧之中，这种怀旧象征着美国沉浸在自身的历史与创伤中，无法为昌盖兹这样的“闯入者”腾出真正的空间。艾丽卡所居住的那个充满艺术气息、看似开放的纽约公寓，对于昌盖兹而言，其在隐性层面上是一个永远无法被填满的、属于另一个人的“空缺”空间。最终，昌盖兹对美国的重新认知，体现在他对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的定性上。这家他曾引以为傲、象征着全球资本主义巅峰的公司，在其隐性叙事中，逐渐显露出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智利进行项目估值时，他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为美利坚帝国效劳，而自己则成了“一个现代版的苏丹禁卫军战士。”曾经象征着成功的办公室，此刻在他的眼中，已然是推行经济霸权、剥削他国的工具，是一个异化人性、让他背叛自己文化根源的场所。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个空间，“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它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被剥削者）身上碾过”。（p.139）空间的变质映射了他“美国梦”的破碎与身份重塑。

在拉合尔与美国这两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之外，小说还描绘了马尼拉、瓦尔帕莱索等全球化的“第三空间”，这些地点是昌盖兹身份认同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催化剂。显性叙事中，这些地方对于昌盖兹来说是中立的、非情感的、纯粹的职业场所职场。他对这些地方的企业进行估值时，全然不顾其行为可能对当地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冲击，他认为“这些工人会不会被解雇，这些唱片会不会转到别的地方去生产？我们，当然是间接地，将帮助做出决策。”（p.61）但在隐性叙事中，与当地人的互动揭示了其“加害者”身份。智利瓦尔帕莱索的出版商，一针见血地将他比作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那些被帝国从被征服民族中挑选出来，反过来为帝国效力、压迫自己同胞的精英士兵。这个比喻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碎了空间的中立性表象，让他意识到自己是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共谋者。他引以为傲的专业能力，在这一刻显露出其暴力与侵犯的本质。空间的隐性叙事，让他看

到了自己与那些被他评估的菲律宾司机、智利商人在权力链条上的真实关系。正是通过意识到空间的真实意义，他才完成了从一个体系的忠实信徒到彻底反叛者的蜕变，并最终下定决心返回巴基斯坦。

哈米德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通过对关键空间的双重书写，展现了从“好客”到“审判”、从“中立”到“共谋”的权力逆转。他借由空间显性与隐性叙事之间的巨大张力，将人物身份的撕裂与重构，以及后“9·11”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与国家、文化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呈现。这种独特的空间叙事策略，与悬念设置、形象塑造等手法交织构成了小说最核心的艺术魅力，它迫使读者不断超越表层情节，深入思考权力话语如何通过定义和控制“空间”来生产、协商乃至颠覆我们的现实感知。

五、结语

哈米德在《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并未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而是构建了显性与隐性并行的双重叙事进程。这一核心艺术策略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将悬念的反复营造、人物形象的多重建构以及空间叙事的双重书写紧密融合。小说以美国陌生人身份这一核心悬念为引，驱动着表层故事的发展；同时，通过对拉合尔茶馆这一核心场域的颠覆性书写，将其从一个象征东方好客的开放空间，逆转为一个充满心理压迫与权力博弈的隐性审判场，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在的身份撕裂与外部世界的宏大冲突。正是这种表层与深层、明线与暗流之间的持续对话、补充乃至颠覆，使得文本超越了单一的后“9·11”批判，促使读者在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叙事张力中，反复审视在全球化浪潮与文明对峙阴影下，身份、权力与文化边界被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复杂过程。小说的开放式结局，正是双重叙事张力延续至文本外的体现，将意义阐释交由读者完成，从而强化了作品的反思深度与艺术开放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ou Weiw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4619-4001>

References

付满（2019）：“《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新蒙昧主义解构”，《外语研究》（05）：100-106。

[Fu Man (2019). “Deconstruction of Neo-obscurantism 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5): 100-106.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19.05.017>.]

莫欣·哈米德（2009）：《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吴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Mohsin Hamid (2009).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translated by Wu G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庞好农、刘敏杰（2022）：《非裔美国小说艺术研究》。科学出版社。

[Pang Haonong, Liu Minjie (2022). *Research on the Art of African-American Fiction*. Science Press.]

朴玉 (2019):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跨国视域中的‘承认’与‘成长’”, 《外国文学》(03): 14-22。

[Pu Yu (2019). “‘Recognition’ and ‘Growth’ in Mohsin Hamid’s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Foreign Literature* (03):14-22.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9.03.002>]

让-保罗·萨特 (2007): 《存在与虚无》, 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Jean-Paul Sartre (2007). *L’Etre et le Néant*, translated by Chen Xuanliang et a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申丹 (2021):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Shen Dan (2021). *Research on the Dual Narrative Process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庆生 (1987): 《文艺创作知识辞典》。长江文艺出版社。

[Wang Qingsheng (1987).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Knowledge Dictionary*.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夏辉 (2021):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哀悼与忧郁症的伦理逻辑——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解读”,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02): 135-141+157+160。

[Xia Hui (2021). “The Ethical Logic of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Freud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02): 135-141+157+160.]

Ahmed, A. I. (2021). “The Invasiveness of Healing in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02):314-323. DOI: <https://doi.org/10.1080/00111619.2021.2002801>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Faheem. M.A. (2022). “Postcolonizing Bildungsroman, Erziehungsroman and Zeitroman: Reexamining the (Anti) Colonial Tropes in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04): 576-586.

Foucault, M. (1984).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Paul R. (Ed.), *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 Books: 252.

Haider, N. (2012). “Globalization, US Imperi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A Study of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South Asian Review* (02): 203-238. DOI: <https://doi.org/10.1080/02759527.2012.11932885>.

Hartnell, A. (2010). “Moving through America: Race, place and resistance in Mohsin Hamid’s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3-4): 336-348. DOI: <https://doi.org/10.1080/17449855.2010.482407>.